



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

THEY DARE TO
SPEAK OUT

保罗·芬德利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THEY DARE TO SPEAK OF

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

〔美〕保罗·芬德利 著
武秉仁 戴克伟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年·北京

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front Israel's Lobby
by Paul Findley
Lawrence Hill & Company, 1987

责任编辑：周善群

责任校对：胡汝娜

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

〔美〕保罗·芬德利 著

武秉仁 戴克伟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3.75印张 字数32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01-0113-9/D·12

定价：4.45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保罗·芬德利是美国众议院前议员。他以本人的亲身遭遇和大量生动的调查材料，冒着很大风险揭露了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从白宫、议会到国防部和国务院等要害部门，从学术、新闻界到宗教界等进行的各种触目惊心的活动。本书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连续九周被评为《华盛顿邮报》最佳畅销书。作者对亲以色列势力的巨大影响和给美国造成的损害深为忧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本书内容翔实，材料丰富，叙述生动，对了解国际问题和美国内部情况很有益。现特译出以飨国内读者。

再 版 前 言

本书敲响了一声警钟：以色列正通过其深入四面八方的院外活动集团的力量，威胁着美国所崇尚的各种价值，尤其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我们对人权的承诺。

本书自14个月以前问世以来反响热烈，而且常感人至深。尽管有人企图以非正式但行之有效的办法来阻止本书的销售，但本书仍连续9周为《华盛顿邮报》评为前10名畅销书。

本书第一版已售出52,000余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读者的热情。例如，有许多读者大量购买，分送朋友、同事和公共图书馆。有些读者劝说各家书店进书，尽管起初的反应往往是否定的、不真实的和不友善的。譬如说，“此书已绝版”、“我店正常批发渠道不供此书”、“该书有很大争议”等。本书出版后两个月，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家大书店的店员竟对顾客谎称此书尚未出版，说“同当局发生了麻烦，还有人说政府要在出版前进行审查。”^[1]

在匹兹堡，一些妇女威胁要封锁一家书店，老板才勉强同意摆出此书。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些市民将书送至各家书店，要每家代售数本。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名退休会计常在同行福利部演说，动员各会员购买此书，而且保证此书内容如不能让读者“怒不可遏”，则由他照赔书款。^[2]

另一些人的反应也是激动人心的。有600多位读者不辞辛劳打电话或写信给我，其中许多人要求了解如何能制止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正在造成的损害。

这种情况令人满怀希望，但所发生的另一些令人震惊的事

件，也使本书所提出的警告具有更大的紧迫性。最近所发生的事态，令人痛苦地表明，长期以来被视为我国最忠诚盟友之一的以色列，既不忠于美国的理想，也不忠于美国国家。以色列政府刺探美国情报，欺骗我国的最高级官员，破坏我国的政治制度，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以适应其本国的目标。

国会和行政当局对这些不忠的作法似乎处之泰然，继续在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职员理查德·B. 斯特劳斯曾在华盛顿注册为以色列利益从事院外游说活动。他在一篇文章中称，当国务院研究中东问题时，“考虑的只是以色列的利益”。^[3]今年，国会没有异议地批准向以色列提供空前的45亿美元的赠款援助。

院外活动集团的各种压力给我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新的损害。1986年5月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挫败，参众两院以压倒的多数（73票对22票和356票对62票）否决了总统向沙特阿拉伯出售3.54亿美元军火的建议。国会拒绝总统向外国出售军火的建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4]

以色列及其院外活动集团尽管公开否认，实际上是向参院施加了强大压力。因为能否推翻总统否决的关键性表决将在参议院进行。^[5]即将退休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支持出售军火，对以色列的反对表示痛惜，他宣称“我希望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屈服于别国的强大压力、金钱和威胁。”^[6]当唱票时，里根总统施加了强大压力才在100席的参院中争取到34票，仅以一票多数组维持了总统的否决。

院外活动集团的压力也损害了同约旦的关系。1985年10月，里根总统公开建议向约旦出售15亿美元的军火，引起74名参议员立即动议反对。里根总统意识到必然会被国会否决，只好将这笔生意全部取消，违背了对约旦侯赛因国王的诺言。后来，侯赛因难过地表示“30年来极为密切的关系”已告结束。^[7]

反阿拉伯的院外活动使美国损失的远不止于威望和善意，而

且砍掉了美国工业界成千上万的职业。沙特阿拉伯45亿美元、约旦15亿美元的军火生意转到了英国。^[8]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该年因院外活动集团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200亿美元。^[9]

在吉米·卡特任总统期间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唐纳德·麦克亨利说：“由于（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我国政府无法维护本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10]

布置罗网

亲以色列的各种势力通过众多办法施加压力。

巴尔的摩市犹太人的敌对态度迫使查尔斯·马赛厄斯决定离开参院显贵的职位。^[11]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迫使华盛顿和纽约的两家教育电视网（WETA和WNET）取消称作“燃烧点”的电视节目，因为在该节目中，播放两部亲以色列影片的同时，也有一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影片。^[12]公共广播社的电视台不顾犹太人的强大压力，拒绝取消的要求，播放了这部影片。

美籍阿拉伯人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有时是致命的伤害。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于1985年10月在地中海残酷杀害利昂·克林霍弗*后的48小时之内，一名巴勒斯坦后裔的美国公民遭到暗杀。美国阿拉伯人反歧视委员会一名地区主任亚历克斯·奥德赫在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办事处时，一枚炸弹爆炸，身负重伤。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受洛杉矶一家电视台采访时曾说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是一个愿意讲和的人。

一个月前，两名警察在上述反歧视委员会波士顿办事处门前

* 利昂·克林霍弗，美国残疾人，行动需乘坐轮椅。1985年乘意大利游船在地中海旅行时，该船被巴勒斯坦人劫持，因为他是犹太人，被劫持者杀害——译者。

拆除一枚炸弹时，因炸弹爆炸受伤。一个月后，反歧视委员会华盛顿全国办事处失火，损失50万美元，事出蹊跷^[13]。

还有，密尔沃基市一名巴勒斯坦背景的食品店主被杀。钱财货物皆未丢失。在费城发生两起案件，一名美籍阿拉伯人报纸编辑被殴致重伤。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位知名的伊斯兰学者伊斯梅尔·法鲁奇和他的作家妻子洛伊斯在家一起遭杀害，警察判定并非盗窃案件。^[14]

受雇于以色列的间谍招认罪行

1986年6月，各报登载了一条大字标题新闻：以色列间谍网渗入美国政府窃取机密——海军部雇员乔纳森·杰伊·波拉德招认受雇于以色列充当间谍。波拉德的妻子企图销毁一手提箱窃取的文件未遂，承认犯有轻一等的罪行。

波拉德说，过去10年中他向以色列提供机密文件获得4.5万美元，应允给他的报酬达30万美元以上。他持有一份化名的以色列护照。涉及此案的另外三人皆是以色列官员。以色列政府后来不顾事情的败露，给这三名官员加官晋级，岂非颠倒是非的咄咄怪事。^[15]此案应波拉德请求未予公开审判，使以色列得以避免窘境。公开审判必将庞大间谍网在美国活动的详情及以色列参与最近向伊朗运送军火事件公诸于众。在司法部任职达30年之久的前国内治安处处长约翰·达维特认为以色列在美国的间谍活动“除（苏联）克格勃以外，比任何国家都更为活跃。”^[16]

联邦调查局可以举出一二十起美国官员非法向以色列提供机密情报的事件，但提出起诉的仅波拉德一人。^[17]当职业官员们对司法部放任以色列窃贼逍遙法外的作法已经忍无可忍之时，波拉德的被捕可能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以色列向霍梅尼的军火销售网

美、以向伊朗出售军火的危机不断发展，所引起的一场争论现时已震动里根政府。以色列自阿亚图拉·霍梅尼1979年上台以后即开始向德黑兰运送军火，是这场危机的起源。这种军火生意甚至在霍梅尼政权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那些极为痛苦的444天期间也未曾停止（皮埃尔·塞林杰在1981年8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专题新闻”节目的评述）。

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的目的，是以此换取霍梅尼的支持者释放在黎巴嫩扣押的美国人质。在此事很早以前，以色列就指示波拉德搞到有关“可能向伊朗出售的”外国导弹系统的美国秘密研究报告。1986年4月，在美、以秘密销售网开张向霍梅尼出售军火的同时，由以色列授权充当军火掮客的以色列退役将军阿伯拉罕·巴尔-阿姆和数名以色列同谋则被指控图谋向伊朗出售25亿美元的美制武器。^{〔18〕}

同美国结成的这种新的伙伴关系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其原因有二：使以色列同德黑兰长期以来的军火交易合法化，美国过去对此曾表示遗憾；更重要的是，挑起美国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新矛盾，这些国家担心如果伊朗利用以色列和美国供应的武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那么霍梅尼式的革命就可能在他们国家内发生。

轰炸阿拉伯人

1986年4月美国飞机轰炸了利比亚的五处目标，成为以色列军事袭击阿拉伯人的积极同伙，而且奉行着一种危险的军事政策新理论。

里根于4月14日下令轰炸。他说，因为“有无可辩驳的证

据”证明利比亚对西柏林和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袭击负有责任，但后来又说这些袭击是叙利亚干的。〔19〕

美国的上述说法表明它第一次采纳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对某一外国的军事袭击，就是打击另一国单独恐怖主义活动的合理防御手段。这种行动虽然违反国际法，但以色列在对黎巴嫩、叙利亚、突尼斯和伊拉克发动“报复性”袭击时，早就这样干了。

一本畅销书的崎岖遭遇

同我一起编写和推销本书的人，都抱有一个简单但紧迫的目的：我们希望本书能唤起美国人民的警觉，看到我国政府明显偏袒以色列所带来的危险。

不出所料，为了本书的出版，我们遇到许多困难。例如，竟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找到一家出版商。两家大出版商——兰顿出版社和威廉·莫罗出版公司——虽然对文稿倍加称赞，但却直言相告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过于敏感”。威廉·莫罗出版公司的布鲁斯·李说，该家公司断定出版此书“必在公司内外带来麻烦”，因此决定“不接受这桩生意”。前后共遭到20多家的拒绝，才在1984年7月找到一家小的但受人尊敬的出版商劳伦斯·希尔出版公司，愿意冒此风险出版本书。

帮我收集材料的大多数人都坚持不要披露姓名。一些人在联邦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大家对本书抱有很大热情，而且深信有必要早日问世，但他们也承认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可能损害他们个人的事业。

挺身而出给予勇敢支持的其他人还有：罗伯特·威克泽，他是我的密友并担任我在国会的工作班子主管达14年之久，不幸于1985年12月在洪水中丧生；唐纳德·内夫，记者和《为耶路撒冷而战的勇士》一书的作者；乔治·韦勒，获得普利策奖（美国于1903年起设立的一种在文学、艺术、新闻界颁发的奖金——译

者)的外国记者;前参议员詹姆斯·G.阿布雷兹克;和《对自由的打击》一书作者詹姆斯·恩尼斯。桑加蒙州立大学从美国中东和平研究所的基金中拨出一笔津贴,支付了我编写本书的大部分费用。

本书引起了传播界的极大兴趣。各大报刊、杂志共刊登有30多篇书评。我上了70多次电视和电台节目,其中包括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公共广播社的“美国之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查理·罗斯节目”等。这种机会仍在继续而且颇受大家欢迎。

然而,有几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拒绝播送本书的收费广告。新闻有线电视网是一家例外,其行政主管人特德·特纳否决了下属的意见,授权在1986年1月期间播放19则广告。这套节目刚开始播放,即收到得到营业执照的广告商的强烈抗议,但特纳敢作敢当,不加修改让这套节目继续播放。

但是,新闻有线电视网也免费为反诽谤同盟提供了一套八节时间相同的广告作为补偿,因此少收入亲以色列势力的广告费8,000美元。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读者们提出这一问题,答案就是扩大本书的读者。考虑到公众对我们所遭受的损害仍惊人地缺乏了解,本书第一版所售出的52,000册只能算是一个开端。为此,该出版商将此书再版。本书在各书店和该出版社均有出售,也可在周日期间打免费电话1-800-368-5788购买。

希望继续了解以色列及其院外活动集团最新情况的读者,可参阅《华盛顿中东事务报道》月刊(Washington Report of Middle East Affairs, Box 53062, Washington, DC, 20009)和《以色列外交》月刊(Israeli Foreign Affairs, 5825 Telegraph Ave. No. 34, Oakland, CA 94609),《中东问题》半月刊(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Box, 53365, Temple Heights Station, Washington, DC20009),《美籍阿拉伯人事务》季刊(The Ameri-

can Arab Affairs, Suite 411, 1730 M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和《巴勒斯坦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Georgetown Station, PO Box 25301, Washington
DC 20007)。

保罗·芬德利
1987年1月1日

目 录

	页 次
译者的话	(iv)
再版前言	(v)
导 言 中西部国会议员遇上中东问题	(1)
第一 章 国会山之王	(29)
第二 章 压制微弱的呼声	(60)
第三 章 审议机关不能审议	(100)
第四 章 院外活动集团与椭圆形办公室	(136)
第五 章 渗透国防部和国务院	(165)
第六 章 “自由号”遭袭击之谜	(198)
第七 章 对学术自由的挑战	(216)
第八 章 图森市恫吓案	(256)
第九 章 教会与国家	(287)
第十 章 犹太人中的不同政见者	(318)
第十一 章 超出波托马克河两岸的院外活动	(345)
后 记 补救损害	(379)
注 释	(399)

导　　言

中西部国会议员遇上中东问题

“来自美国农牧业中心地带的一名议员，怎么会卷入了中东政治？”人们不解地问。同大多数农村议员一样，我的选区居民没有什么外国利益需要向我游说。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农业委员会，主要处理农业、预算和福利改革等议题。

1972年，我被指派参加欧洲和中东问题小组委员会。我所代表的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过去12年来在国内外都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

短短的八年之后，我涉身了中东政治。这使我在许多美国犹太人中声名狼藉，在以色列臭名昭著，但在阿拉伯世界则大受赞扬。1980年，我远离伊利诺斯州中部了解和信任我的当地犹太人，在那些亲以色列势力活跃的城市中心投入了本州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竞选运动。我的对手从东西两岸和芝加哥附近弄来大量的美元，把我说成是“以色列的第一号敌人”。阻止我的当选活动，成了以色列院外活动的主要目标。

在我参加欧洲和中东问题小组委员会初期，由于受到伊利诺斯学院一位教授的启发，我已开始怀疑美国中东政策的明智性。但在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向别人谈起这些怀疑。这倒不是由于我担心有什么政治后果，实际上我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质疑我国的政策而不会遇到麻烦。我没有意识到以色列的利益是如此之深地渗入美国各机构之中。

议员们通常只能听到以色列的一面之词。美国阿拉伯人的院外活动那时还不存在，即使在今天这种势力仍然羽毛未丰。阿拉伯各国大使馆当时对院外游说活动兴趣索然，即使在今天还是不大情愿聘用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即使某位议员想听听阿拉伯人的观点，他也难于找到一位阿拉伯发言人为他解释问题。

我个人卷入中东政治是从处理同阿、以冲突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位选民的问题开始的。1973年春，我收到埃文思·富兰克林夫人一封信。她曾为我担任过编辑的一家农村周报纂写过社区新闻。她在信中恳求我设法拯救她远在千里之外被关押的儿子埃德。他的儿子被定成间谍罪，判处五年单独监禁，正在马克思主义的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南也门）首都亚丁服刑。读完她的信后，我不得不查阅地图寻找亚丁的位置。我那时只晓得亚丁一度是英国的重要军事基地。

他母亲在信中对我说，如果不是由于许多航班被取消，富兰克林根本就不会踏入亚丁的土地。他从埃塞俄比亚前往科威特去教书，由于改变路线要在亚丁转机，后来又因从亚丁出发的航班取消而再次受阻，结果使他触了更大的霉头。他喜爱摄影又不了解当地的规定，因此拍摄了禁区的照片。亚丁人对六年前英国人离开不久所发动的突然袭击仍记忆犹新，因此对黄头发的游客总是心存多疑。富兰克林刚拍完照片即刻被捕，在一所审问所关押数月，最后开庭审判，定罪判刑。我为争取释放他所作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得到国务院的协助。1969年的政变使该国政权大幅度左摆。此后，我国政府同亚丁一直没有外交或其他关系。因此，国务院不能采取直接行动。我只好请求埃及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帮忙。富兰克林的父母——住在路边小村内收入有限的农民——也向南也门总统萨利姆·鲁巴伊·阿里写信，请求宽大处理。我也发出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我国政府曾要求英国人通过他们驻亚丁的使馆从中调停。但上述所有行动都没得到任何反响。

1973年12月，我拜访了亚丁驻纽约联合国大使阿卜达拉·阿什塔勒，问及我是否可亲自前往亚丁为富兰克林的释放说情。阿什塔勒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秀的年轻外交家，当时正在纽约大学读晚间的研究生课，他答应尽速答复。两周后，回答说欢迎我去访问。

如果我决定去，我只能只身前往。自1967年该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将是第一名访问亚丁的议员——包括参议员或众议员。也是1969年发生政变断绝两国外交关系以后，第一名访问的美国官员。这次访问虽然令人兴奋，但也使我有些不祥的预感。此外，我没有外交使节的受权。有人将南也门称为阿拉伯世界的古巴。国务院认为该国是最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国务院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亚丁的外交部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职位，“是由于他比任何其他候选人屠杀反对派都多”，这话没有丝毫减轻我的担心。

一些问题烦扰着我。我将受到何样的接待？我同主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小艾尔弗雷德·艾瑟顿讨论此行时间时道：“如果他们把我关起来，你首先怎么办？”他微笑地说，“再找一位议员去把你救出来！”

然而，我大概是能够给予帮助的唯一的人。富兰克林的母亲对我说，“我简直担心埃德能否在也门的监狱内活上五年。”我妻子露西尔对此行的前景极为不安，但也觉得我除了前往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我还想到，此行可能是同十分重要但了解甚少的世界那个部分改善关系的一次机会。苏伊士运河即将重新开放，同亚丁改善关系对美国在印度洋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亚丁同法国控制的吉布提一起扼守着世界闻名的极为重要的海峡——通往苏伊士运河的门户。苏联的援助代表团和军事顾问已在该国频频出现，如果苏联得以控制亚丁政府，就能有效地从南部控制苏伊士运河。除了救援富兰克林以外，美国显然也需要同亚丁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决定前往，起程日期定于1974年3月下旬。

几位中东学者告诉我，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不久将开始在埃及、以色列之间的穿梭外交，他在亚丁很受敬重。我请他写封信，以便我随身携带，并请他对美国同亚丁的关系提出尽可能明确的意见。在出发前三天，我收到了他的亲笔信。基辛格称赞我前往亚丁的“人道主义使命”，还说：“如有机会，盼能告知你所会见的官员，我们将继续保证为公平和持久的中东和平做出努力，我们期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

该信是写给我本人而不是写给亚丁政府的。这是一个外交“触角”。我希望这封信能使我将要见到的官员相信，美国想建立正常的关系。

老练的旅行者往往是要带礼物的。我采纳了一位埃及朋友的建议，为南也门的学生在伊利诺斯州的三所学院争取到了奖学金。我还找到并精心包装好两册译成阿拉伯文的卡尔·桑德伯格纂写的林肯传记《在草原的年代》。此外，我还带去两尊小的林肯半身雕像。林肯是名闻遐迩的我区选民，希望他的名声能远播亚丁。

我从华盛顿出发的日期甚早，因此在南下亚丁之前有时间先访问叙利亚。叙利亚自1967年同以色列的战争以来，同美国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该国日益重要，但五年来没有一名众议员访问过该国。出乎我意外的是，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同意不经事先约定而接见我。或许他觉得来了一位自称对中东问题不抱成见的美国议员，感到十分新奇有趣。

阿萨德在他办公大楼二楼一间宽敞的接待室接见了我。他身量高大，体格健壮，前额突出，态度热情从容。他有力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不含敌意。他一边呷着小杯的芳香的叙利亚咖啡，一边陈述着对美国支持以色列行动的不满。他说：“你们向以色列供应大炮和弹药，使我们怀恨在心。我们能不怀恨吗？但是，怀恨并不是敌视。实际上，我们对美国人民怀有很深的感情。尽管发生了这场战争，叙利亚人民还是喜欢美国人，而且多年来都如